

理性的追踪

新时期文学批评论纲

姚鹤鸣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理性的追踪

——新时期文学批评论纲

姚鹤鸣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理性的追踪——新时期文学批评论纲

姚鹤鸣 著

责任编辑 章俊弟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马家街31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省高淳印刷总厂

（地址：高淳县镇北村34号，邮政编码：211300）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69,700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343-3189-7

G·2903 定价：11.40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我斗胆试写一本类似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小书。之所以称谓“类似于”，乃是出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写“史”的条件尚未具备，这条件，主要是时空的条件。一般来讲，史著是对以往历史现象的总结。尽管在我界定的作为文学发展历史阶段的“新时期”到了80年代末已经结束，90年代开始的文学创作实践及文学理论批评有它不同于前期的特点，但毕竟时空是切近的。作为史著，如果投视距离太近的话，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任何历史著作，都不可能把所有历史现象一并写进去，它必须有所选择，有所保留又有所舍弃，而哪些是有历史价值的应当保留，哪些是无多大历史价值的必须舍弃，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沉淀，需要隔开一定的空间范围。原型批评的著名观点“退后几步看”对于史著作者来讲无疑是值

得重视的。这恰如看一幅画，太近，则只能分析其笔触技巧，退后几步，则可能看出其布局谋篇，往后退得更远，所见便是作品的原型结构。我们只要看一下现成的文学史著作，实际上就可以认识这一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总结。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游编《中国文学史》、唐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高校合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探》，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一部比一部差。这决不是编者个人智力才能上的问题，而正是为时空条件所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坐等时空的流逝改变，然后有朝一日写下一部具有永恒生命的史著。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总是需要不断“重写”的，正如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的尧斯在他的《艺术史与实用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文学史是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与现在视野的直接交融”。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尧斯的论述对文学史实的客观性是否否定过多，对现在视野是否肯定过分，以至会导源出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但史家头脑里多多少少充斥当代意识却总是个事实。正因为如此，文学史才会不断“重写”，也必然不断“重写”。然而，恰恰正是在这一代一代不断“重写”之中，史家们在克服了近距离和短时间烙下的印迹，避免了个人情感的卷入而站在离时代遥远的制高点上俯视之后，历史现象经历了无数次的筛选扬弃，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获得“永恒”。显然，按照这一点来看待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史构架的研究尚嫌过早。

其次，我不能写一部名副其实的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史还有我个人的兴趣智力才能上的问题。普遍的认识，史的著述需要占有详尽的史料，史著的航程是漂浮在庞杂纷繁的历史现象的洋面上的。这自然并非说明史著就是“掉书袋”，但史著作者需要有“掉书袋”的广博史料积累却似乎是人所共识。当我们翻开《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人会为勃兰兑斯的博学所倾倒，勃氏的史著的确无愧于这方面的典范。而我，恰正缺少这方面的才能，甚至于兴趣也不

浓厚。在我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种种现象时,有许多东西在我面前一晃而过,如同过眼烟云。在我笔记本上记下的或在头脑里刻下的仅仅是众多现象中我所感兴趣的那些史实,即在我看来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当然其中最为印象深刻的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作者和他们的著述论文。在此基础上加以宏观地考察,尽可能勾勒出一条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线索。因此,说史,谈不上,但又似乎“类似于”史,因为我所关注到的一些文学理论批评现象,虽然有着逻辑上的共时关系,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它们毕竟分别代表了不同阶段理论批评的主流。

其实,在我看来,文学史、理论批评史应该是有着多种写法的,这都因史家的不同而有种种。它可以以编年史一类的文体出现,严格按照历史顺序把文学现象进行巨细的排列,大部分文学史著作都属这一类;它也可以偏离编年史的体例,完全依据史家的认识统纳尽可能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即是;它还可以采用描述式的方法,在文学史实中掇其需要者,加以整理归纳,从而理出一条以抽象观念为主导线的文学发展脉络。前两种史著方式,一般已为大家熟知,这第三种尚不多见,其实也应归入史著范畴之中。它的特点是远距离地觐观文学发展整体,对各种文学现象作一番快速的巡礼,然后把对象中最基本的、不可忽视的轮廓碑拓下来。这样的史著对于史家来讲,特需高屋建瓴的架势和宏观投视对象的能力。我不揣微力,企望写就一本探讨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小书,正是基于这一史著方式开始我的思考的。

诚然,诚如我一开始所讲的是“斗胆”,我深知我才能和知识的浅薄,但既然希冀写就,那就不得不思考有关史的著述的几个理论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史”和“论”的关系。环绕着史著构架的基本规律,似乎我们一直听到两种意见的争论,即所谓“论从史出”和

“史从论出”。前者强调史实的客观制约作用,认为有“史”,才能推导出“论”;后者则重视“论”的统领作用,认为“论”先“史”后,有什么样的“论”才有什么样的“史”。对于这两者,我们以前一段时间一直信奉“论从史出”,视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视后者为唯心主义。与此同时,在西方,却时闻逆声,英国的科林伍德就直言:“历史什么也不是,只是在历史学家的大胆里,将过去重新制定一番而已。”(转引自《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7页)这一观点无非是说,历史学家预存有理论观念,“史”不过是“论”的产物罢了。当然这话相当耳熟,因为胡适的话语“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就是此意。

上述两种史论观点,其实并非百年来的事,中国早就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对立。“我注六经”,强调的是尊重客观史实;“六经注我”,强调的是史家的史学观念。对台戏一直唱到现在。似乎是先有“史”后有“论”,还是先有“论”后有“史”,如同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幽默故事一样古老而又难解。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科学和民主的讨论空气下,学术界现在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史”和“论”无以分先后,“一方面最大可能地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客观性,虽然这种客观性只能在主观的形式中获得相对的表现,但客观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跌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淖。另一方面又应力求拿出嶙峋不凡的眼光和主见来,烛照研究对象。这样两个方面的结合,其实就正是史与论的凝结。”(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版)这样的见解比较起以前的两种极端观点来,无疑是大大进步了,也显得相当的公允正确。不过在我看来,总觉得还嫌模糊,“史”和“论”之间毕竟还有个环环扣套的逻辑依存关系,这恰如鸡生蛋,蛋孵鸡,虽分不出先后却代代相传,总不能笼统地以“鸡与蛋辩证地统一”一言以蔽之。

让我们先从“史实”谈起,“论从史出”的观点就是以尊重史实的客观性作为其支柱的。然而“史实”到底实到何种程度,它到底有

多少客观性是很可疑的。只要我们承认“史实”都是记载，或口头流传记载，或文字典籍记载，那么我们就谈不上绝对的“实”，谈不上绝对的“客观性”，因为人们对于任何现象，哪怕是当时的现象在人们的眼中耳中都必然打上观者听者主体的印记，正如列宁所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30页）直面现实是如此，更何况久远的历史现象呢？西方的现象学和阐释学曾经提出过“走向事物”的口号，认为对一切现象的解释，解释者只有消解自我，才能达到现象的本意。应用于文学研究也同样，认为研究完全是被动地接受历史（作者）给定的东西，阐释只是努力回到文学现象的本源，为此，解释者应该是一片真空，一块透明体，不带丝毫偏见，不加进半点属于自己的杂质，目标只是原原本本地把文学现象的本来面目复制出来。这种纯粹客观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似乎是超越西方理论之前，仇兆鳌自序《杜少陵集详注》中就说：“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概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可是，我们可以诘问，这种希望超越千百年之上的时空距离，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走向事物”的理想，是否是一种幻想呢？研究者自以为排除了一切主观偏见后得到的历史现象的本源，除了他的自觉和自信，又有什么客观的办法证明那真是属于历史现象本源而非属于研究者的苦心呢？所以，我认为，要说历史，它决不是史的历代，而是历代的史。准确地讲，是历代的人展转流传的史。既然史实是不可能纯客观的，其间复杂性难于言清，那么尊重史实，相信史实，恰好适得其反，倒不如我们尊重自己，相信自己，通过自己的选择和挑捡，明辨前人承传于我们的史实来得离真理更近些。有鉴于此，我倒宁愿主张“史从论出”，因为对于史实的选择、挑捡和明辨不可能没有理论预存于先。事实上，每个史家在“史”的著述前都是有明确的“论”作

为指导和规范的,也即以“论”来观察“史”,思考“史”。

不过,须说明的是,我主张“史从论出”是既有它的前提条件又有它的后继内容的。“史从论出”的“论”,不是先验的“论”,它是史著作者凭借过往的历史材料,包括历史现象的记载和历史现象的评论统概的一切历史遗产,经过自己接受、改造和创新的理论,没有哪一个史家能够不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理论的。从这一点上讲,可以说“论从史出”,但这只是说在自己史的著述之前的准备阶段。一旦史家进行自己的史的研究和著述,那么,理论框架的规范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只有在自己规范的理论框架的制约下,他才能合目的地对过往的历史材料重新进行思考、整理,才能撰写出自己的史著来。这就是我所谓的“史从论出”。我想,任何史的著述都应有这样两个阶段。而当一部史著的问世,它就又成为历史的材料为后人所承继,供后人接受、改造和创立出新的史论。这样的环环相套的逻辑关系,也许要比仅仅用“史论结合”的笼统而模糊的说法更清楚一些,更有规律可循些。也只有这样,历史才可以一代一代地为人们所一再研究,史著才一本复一本地提供给人们去思考和品味。当然,这里还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史从论出”,又并不是“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应该“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6卷第257页),即以理论去准确地解释一切事实,而不是不顾事实,回避事实,更不是削足适履地任意摆弄事实,以杜撰历史的进程。

第二个理论问题是关于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与社会政治史的关系。历史总是要划分成阶段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也同样。因而史著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相对地把历史的长河分成若干段落。最早有关文学史著的编撰是比附于社会政治发展史的,有的具体到以王朝的更迭和君王名来命名文学史的阶段,或以此作为划分文学史阶段的标准。例如很有代表性的国外以“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等来划分英国文学

史,我国则以“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等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史。这种把文学发展的历史与一般历史加以比附的做法,现在已为学术界所非议,诟病的最主要理由是把文学史看作是一般历史,尤其是看作社会政治历史的一部分,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诸种特征。而我们知道,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和逻辑,它和一般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并不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文学史上可以举出大量的事例来证明,政治变革、王朝更迭并不意味着文学相应地会随之而变革发展。关于这一理论观点,我完全信服它的科学性。但是,对文学历史现象的具体考察,还使我对之持有一些修正意见。

毫无疑问,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分期总要有明确的历史界标,由于有下面两个原因,就迫使我们设定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分期界标时不得不与一般历史尤其是社会政治历史作一定的比附,或者确切地说,在对文学自身的发展历史做出独特的思考时采用社会政治时代的编年史体例。

其一是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本身没有规范的概念可用来表示历史的分期。文学的历程一般来讲总是缓慢发展着的,其表现形式也常常隐蔽而不明朗。虽然有时候会产生运动式的高潮,但这种突发性的文学运动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已有着渐变的历史过程,文学的新因素早就孕育在传统之中。所以我们在文学史上似乎很少可以找到一个一个的里程碑来清楚地表明这历史的分期。中国文学似不必说,好像以独立的文学概念来构架的史著绝无仅有,就是西方文学也并不是那么完全脱离一般历史的比附的。当我们看到“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的文学阶段名称时,一方面应该认识其独特的文学自身的历史发展轨迹,但另一方面,这种以文学运动为界标的分期骨子里潜藏着的是资产阶级从诞生到登上历史舞台到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过程,它仍然粘着在一般历史发展的车轮上,更何况它是笼统的欧

洲文学史,尚没有具体到各国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去。

其二,更重要的是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文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它和社会的一般发展不成比例,和政治的发展并不绝对的平衡,但它受着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则无疑是事实。也许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欧洲相对来讲比较疏远,在中国,两者的关系则异常的密切。当我们要论述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时,就不得不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传统文化出发来看待这一种关系。似乎早在先秦之时,从原始巫术歌舞脱胎而来的文学艺术就被打上了社会实践理性的印记,并把它看作和社会政治现实休戚相关。中国最早的美学著作《乐记》中就对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怨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乐本》)这里的“乐”,据郭沫若讲,内容包含很广,不仅各种艺术门类都囊括在内,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饌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代表。“乐”与“政”如此相通,自此以降,经儒家一脉相承,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曹丕,他所言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抬高了文学艺术的地位,又把文学艺术牢牢地捆绑到了政治的战车上。可见,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甚是突出的。新中国诞生以后,这种密切关系一如既往。新时期开始后,虽然文艺界一再有人呼吁文艺与政治相对分离,但传统的规范仍然使得文艺的发展随着政治的起伏潮涨潮落。由于新时期文艺的发轫就是借助于政治变革这一推动力,所以它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治的强大影响。1979年和1984年之所以被划定为新时期文艺发展阶段的界碑,实际上就与这两年中的政治决策分不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所

表现出的政治开禁和宽容,使得文艺两度高涨。这些简单的历史回顾,也许不是多余的。正是考虑到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我企图对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行程作一描述时,就不能不与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既相对独立,又时时比附。

第三个问题是文学理论批评史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从理论意义上讲,应该是相辅相成、协作协同的,因为两者的理想是一致的,尽管显现的形态各不相同,理论批评的成果是理性形态,创作的成果是感性形态。理论批评必须以创作实践作为自己的必要前提,因为创作实践毕竟是理论批评思维的对象。没有创作实践,理论批评就不复存在。这种理论批评对于创作实践的依赖性,在文学史的早期尤为突出。理论批评在一开始并没有独立的品格,它只是创作的附庸,它的任务只是解释和阐发创作与创作过程。虽然理论批评家和作家的地位并没有高低之分,理论批评家甚至可以把自己视为良知的化身、公正的法官,理论批评可以而且应该对创作,对作家作出公允的判断,但蕴藏在骨子里的却是随从的身分,它只是跟在创作后面说三道四的清客。及至20世纪,理论批评的独立意识才正式诞生,理论批评家才诘问“批评是什么”的问题,才认识到理论批评不仅仅是对创作的阐释,还有自身的创造,创造出第二个艺术世界。正是贯注于这历史的推延,我们必须明确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文学理论批评不能脱离文学创作的实践,即使20世纪以来批评相对独立也是如此。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理论批评又不能完全拘泥于创作,跟在创作后面亦步亦趋。理论批评,作为一门人文科学,除了创作实践之外,还有另外的思维来源与自身的规律,它常常需要接受科学尤其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虽然文学理论批评是对文学创作的总结和概念规定,但是当它从具体本身上升到抽象,又从抽象综合而成思维“具体”时,已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了。因此,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必然存在着相联系又

相分离的属性。一个时期,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可能是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创作带动理论批评,理论批评推动创作;但另一个时期,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又可能是存在着矛盾,相互抵牾,相互斗争,最终以求得新的协作。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研究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行程的时候,就既需要时时观照创作的实践过程,又需要相应地保持独立,以免让创作牵着鼻子走。事实上,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体现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关系的。刚刚粉碎四人帮之时,文学创作尚没有从“大批判”的模式中走出来,不过是将批判的对象从老干部、“走资派”转向“四人帮”。与创作相似的在理论批评上则猛烈抨击十年动乱期的非正常文学现象。稍后不久,创作实践上掀起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主题思潮,与此同步的在理论批评上开始拨乱反正。如果说创作上的反思文学反映的是以50年代中期以前为理想的社会生活,那么,理论批评上同样恢复以50年代中期确定的现实主义、写真实等文学命题为目标。这以前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系显然是协同的。1980年以后的创作和理论批评就开始了相对分离。当创作上随着改革文学及接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作家作品的出现而勇于突破和探索之时,理论批评由于传统的规范化,缺少对新观念、新领域的研究显得相对的保守,从而一度在拉着创作的后腿。1984年以后的情况则比较特殊,一方面是类似于1980年以后的文坛,传统并保守的理论批评落后于创作;另一方面则另一股理论批评的潮流由文学研究方法论热点起兴的新观念一领文坛风骚,以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动力引导创作前行。

应该说,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时而协作,时而相对分离对于文学的发展无所谓优劣好坏之分,它们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促使它们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这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作为文学史的研究,重要的只需明确它们两者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系。

最后说一下期限划分问题。本书上达粉碎四人帮，下至80年代末期。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新时期”在80年代末已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90年代将是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90年代开始以后，尤其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及至中共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经济政治将有新的特点，文学的机制随之也有了转换。在瞭望新的文坛气象之时，回顾已经过去的岁月，是为本书的宗旨目的。

引 子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总的特点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喧嚣与骚动,历史、现实、未来,仿佛一下子都挤压在十余年之中。

出现这种动荡变化的文学形势,当然是时代的作用,因为社会的一切领域都可以说处在这种动荡变化之中。经济、政治,无不如此。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不难想见我们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一段艰难历程。也许这种动荡变化在历史的变革时期是十分正常的,但正由于此,使得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心理产生了极度的躁动不安。而文学,则最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精神特点。

我们现在所要论述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它的发展阶段既然处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也就显得纷繁复杂。也因此,要给它理出一条完全合乎事实的发展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归纳和概括,

都是以牺牲其他角度、其他现象为代价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抽象归纳和概括，就像一切科学领域一样，尽管它毫无疑问会有缺陷。

目 录

序言	
引子	1
第一章 新时期文论的发轫	1
一、批判性的论争	3
1. “歌颂”与“暴露”	3
2. 艺术中的悲剧和生活中的悲剧	8
3. “两结合”之名实辨	17
二、一次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大讨论	25
1. 从“工具说”质疑到“文艺与政治”关系论	25
2. 飘浮在“大地”之上的“云霓”	34
第二章 旧题的重新审议	39
一、现实主义——一个当代文学理论争辩中的永恒	
“主题”	41
1. “主义”的困扰	41
2. 多角度的“真实性”	53
3. “典型”的昔与今	65
二、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	84
1. 创作实践前奏下的人性之争	84
2. 关于人道主义	95